

◆ 历史教师专业发展丛书

丛书主编 何成刚

海派历史教学透析

HAIPAI LISHI JIAOXUE TOUXI

彭 禹 沈时炼 张炎林 编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历史教师专业发展丛书

丛书主编 何成刚

海派历史教学透析

HAIPAI LISHI JIAOXUE TOUXI

彭禹 沈时炼 张炎林 编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派历史教学透析/彭禹,沈时炼,张炎林编著.—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3
(历史教师专业发展丛书)
ISBN 978-7-303-16779-1

I. ①海… II. ①彭…②沈…③张… III. ①中学历史
课—教学研究 IV. ① G633.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73197 号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g.com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84 mm × 260 mm
印 张:8.25
字 数:180 千字
版 次: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9.00 元

策划编辑:唐正才	责任编辑:唐正才 张彦彬
美术编辑:王蕊	装帧设计:天泽润
责任校对:李茵	责任印制:马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0825

导 读

在基础教育历史课程改革的可持续推进过程中，我们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改革愈深入，难度就愈大，而其根源就在于我们历史老师的史学素养与历史教学素养在处理一系列教学问题上的应对力显著不足。基于此考虑，我们对中学历史教学现状进行了全面仔细的梳理，在此基础上整体规划并设计旨在提高中学历史教师在史学素养和教学素养方面的专业发展方案。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下，“历史教师专业发展丛书”第一辑将陆续出版。

《智慧课堂——史料教学中的方法与策略》

近年来，作为一种重要的历史教育教学理念，史料教学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实践中涌现出的优秀课例，无不强烈地体现着史料教学的价值。要落实课程标准、要上一节有特色的历史课，如果不在史料选取、史料运用和史料解读上下功夫，就难以达到预期目标。任何一节历史课，都离不开史料教学这一环节，而且史料教学理念运用得好与坏，直接决定着教学的有效性问题。从近年的高考命题改革来看，作为一种重要的能力考查目标，史料分析的色彩愈加明显，比重日益增大。如果命题人不能创设很好的史料情境，就难以命制一道好的试题。

基于这种认识，本书聚焦史料教学的方法与策略，通过典型案例分析，介绍了国外史料教学的有关理念，剖析了史料教学中的种种误区，以期为历史教育教学工作者开展史料教学提供参考与借鉴。

《史料教学案例设计解析》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石，也是课堂教学的基本素材。在历史教学中，如果抽掉有价值的史料，或缺少有亮点的史料教学环节设计，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就要面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困境，历史教育这座大厦就会坍塌。既然史料教学蕴涵如此智慧，那么应如何践行这种理念？本书遴选了30个优秀案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解答。

本书的作者阵容强大。他们来自北京、上海、江苏、广东、陕西、安徽等课程改革先行地区，其中既有知名历史特级教师，又有历史教育与研究方面的青年学者。这些作者在史料教学理论与实践研究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他们设计的案例体现了不同区域的教学风格，但都共同指向了“史料教学”这一理念。

本书的内容精益求精。本书并没有纠缠于艰涩的教育教学理论，而是来自

课程改革实验区的典型案例说话。这不仅是因为案例立足于坚实的大地，实用性强；更缘于案例中交织着融会贯通的教学智慧，兼具启发性。为使读者充分理解案例的精华，每个案例除完整叙述过程设计外，还提供了背景分析、史料运用解析、教学反思等。“背景分析”着重说明教学设计的原委和作者的基本设想；“史料运用解析”重在说明运用每段史料的目的与方法，以及史料的可信度与说服力；“教学反思”则超越经验谈理性认识，或提出其他的可能，以拓展读者思维的空间。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是《智慧课堂——史料教学中的方法与策略》的“姊妹篇”，如果能将两者结合起来阅读，收获将会更大。

《历史课堂观察的方法与策略》

本书根据新课程改革的理念，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历史课堂观察的理论基础，并尝试构建一个具有较强操作性的历史课堂观察的方式，以对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的历史课堂教学提出切实可行的把脉和诊断。显而易见，本书最大的特色，是结合历史学科特色的视角开展课堂观察。

本书通过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典型历史教学案例，根据历史教学普遍存在的问题，特别是新课程实施过程中一线教师感到困惑的问题，从不同的观察角度进行分析和诊断，力图给广大历史教师借鉴和反思。

本书还围绕课堂观察重点强调了如下论题：在课堂观察过程中，开展大量阅读、主题研讨、开发观察表、课例打磨、教师团队合作研究等，可以有效促进历史教师的课堂研究能力，全面掌握进行长期性的主题式课堂观察方法与策略，实现历史教师的专业成长。

对于广大历史教育本科生而言，本书是搭建历史教学理论与实践的绝佳平台；对于广大中学历史教师而言，本书是准确把握新课程改革的方向，深入理解历史课堂教学、提升教师专业发展的必备参考用书。

《问题解决：历史教学课例研究》

当我们走进课堂，课堂情境的复杂与混乱让人难以把握——问题丛生的常态课与光鲜照人的优质课让人看不懂课堂的真实面貌，手忙脚乱的年轻教师与娴熟自如的专家教师似乎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带着书本上学来的理论、信心十足地走进课堂的教师，常常被课堂教学情境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独特性”所围困，课堂中所遇到的问题似乎无从下手，解决问题的方式亦似乎不可复制。但是，当我们用研究的眼光去观察和审视课堂的复杂与不确定时，又会被其丰富性所吸引。

正是出于对历史课堂的格外钟情，对课堂研究的执着热爱，本书作者及其领导的研究团队观察、研究了大量的中学历史课堂案例，力图把新课程改革以来关于课程与教学的新理论置于中学历史课堂教学实践的背景下来审视，并通过课例研究，将教师作为实践者的角色与研究者的角色结合起来，寻找历史课堂中被遗漏的信息，并从中分析教师的实践知识。

本书选择了中学历史课堂教学中常见的问题作为研究主题，通过十余个案例

展示历史教师发现问题、框定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以帮助读者认识从教学现象的发现到教学问题的归纳，再到研究主题的确立，是教师作为专业的实践者与课堂教学情境交互的过程，从而体会教师在“能力极限的边缘”工作的快乐与艰苦，认识到教师专业成长是一个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

《海派历史教学透析》

提起海派历史教学，大家或多或少有一些片段的了解，但是对于其来龙去脉及风格内涵，未必有清晰的认识。本书汇集上海老、中、青三代历史教学之代表人物，有回忆，有访谈，有成长案例，有教学实证。从历史而人物，由人物而流派，形式灵动多变，可作轻松的讲古故事，也值得人掩卷长思。编者采访了沈起炜、陆满堂、林丙义等前辈教师，钩沉出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 21 世纪 60 年的教学故事。本书第一次以众多案例集中地向读者呈现了作为海派历史教学代表的“孔派”教学的风貌，也是首次跨越了 60 年历史的对海派历史教学的回顾与总结。

《国外历史教学案例译介》

历史学科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很低，这不仅影响了中学历史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也使中学历史教育教学研究者忧心忡忡，而且新课程改革对这一顽疾似乎束手无策。许多人不禁追问：历史要教什么、学什么？为什么要教历史、学历史？应该持什么观念来教历史、学历史？面对这些“原点”似的问题，本书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资源中，精选了几十个教学案例，并通过分析具体案例，给读者带来启迪与思考。比如：

1. 在拓宽知识的领域、拓展观察的视角方面，本书选译了妇女史、移民史、体育史等内容主题。这些案例告诉读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英国妇女获得了选举权；一个家庭的故事折射出了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变迁；奥运会的赛场竟然体现了“冷战”的巨大能量；等等。

2. 在训练思维方法、提升思维能力方面，本书选译的案例包括：如何培养时序观念、如何对待与分析偏见、如何分析两幅画作等。这些案例告诉读者：时序能力是历史核心思维能力的基础，偏见反映了作者的价值判断，不同的画作对同一事件有着不同的诠释。

3. 在课程资源与探究性学习方面，本书选译的案例包括：漫画中的大萧条、歌曲中的大萧条、电影中的大萧条、如何开展角色扮演活动、怎样动手做历史等。这些案例旨在告诉读者：怎样引领学生进入历史的现场，如何使学生成为“他自己的历史学家”。

我们相信，本书的每一个案例，都会给读者带来一些惊奇；甚至，读者的每一次阅读都会有新的收获。

序

“海派”一说，由来甚早。沈从文以“海派”为“名士才情”加上“商业贩卖”^①，当时虽不无讽刺之意，但在我们看来，其中或许又蕴含着一层褒意。

以本书讨论的上海历史教学为例，“名士才情”可以理解为上海历史教师常有的专业自信与风格张扬。“商业贩卖”可以理解为上海历史教师的价值追求，即将历史的智识“贩卖”给学生。

实际上，这两者正是我们在翻检爬梳一份份访谈记录时所强烈感觉到的。即使是那些我们没能访谈到的历史教师，我们也能够从有关的文字记录以及他人的转述中，深刻体会到这一点。例如：沈起炜介绍的曹雪松传奇，陆满堂模仿任霆上课“这一天，连盲人也看得到光明”的语调，吕登来演义张伯伦冒着生命危险制造慕尼黑阴谋的故事，等等。传奇里，见历史的曲折丰富；语调言辞里，是个性的张扬；小故事里，有历史的幽默与智慧。

可谓时势造英雄，一点也不假。民国时期，上海作为近代远东地区的第一大都会，以开放的国际视野、多元的开放体制吸引着一流的人才，在海纳百川中形成了上海历史教师所独有的个性与上海历史教学所特有的风气，更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上海留下了一支弥足珍贵的教师队伍。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历史教师的个性与才华得到进一步的释放。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上海在基础教育领域，开发出了体现上海特色的课程标准和教科书。此外，上海具有独立的高考命题权。这一切为上海积极进行课程与教学改革，创造了优越的条件，也为上海历史教师施展才华提供了优越的机会。

历史舞台上的人们，顺时代之流而进，或主动，或被动，最后从不同方向都汇聚于历史教学这一方天地：沈起炜为探索救国之路而学习历史；曹雪松在基础教育大幅扩编中从影业走入教坛；陆满堂因为行政安排专攻历史教学法；风光宇从抡大锤的工人成长为著名历史特级教师……他们又像江河中跃出水面的鱼，不惮于展露身姿：沈起炜主持中学历史教师培训多年，编写的高中历史教材享誉十余载；曹雪松的故事到今天尚为人们所津津乐道；陆满堂大力推进上海历史课程教学改革，有开山之功；风光宇主持的名师基地，门生弟子遍及沪上……

基于此考虑，我们在编写本书时，将写作主题聚焦在“人与时代”上。在这一

^① 沈从文：《论海派》，转引自倪文尖《论“海派”话语及其对上海的理解》，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6）。

主题下，本书分三编：“历史”“人物”与“案例”。

“历史”编起自 20 世纪 30 年代到 21 世纪初，分教学、教材、考试三章。

第一章以沈起炜和陆满堂两位先生的访谈为底稿，辅之以其他书面资料、零星访谈及个人经历见闻，尽力勾勒出人与时代的关联。

第二章与第三章分写教材与考试。众所周知，教材与考试是历史教学最重要的环境因素。在本部分，我们用了较多笔墨来写教材和考试的设计者，从中或许可以看出环境与教师之间互相支持的关系。

“人物”编里，我们原先计划要多写一些教师，但是限于篇幅和写作时间，同时也希望尽量避免与已发表的内容撞车，最后我们只选择了三位特级教师，即先后于 1996 年、2002 年、2011 年获评特级教师的钱君端、凤光宇、朱志浩三位先生，来代表“海派历史教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案例”编共七个，前三个选取的是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与 21 世纪初三位沪上名家的代表作，后四个选取的是四位青年历史教师的作品。前后比较、联系，或许可以看到“海派历史教学”在课堂中的传承与发展。

写作本书的目的，不在于炫耀上海历史教学的成就，而在于更好地继往开来。正因为此，我们愿花一些时间来叙写“海派历史教学”，留下一份“不完全”的记录。当我们聆听前辈回忆的时候，当我们翻阅陈旧的教学杂志的时候，我们看到无数前辈如隐没在云间的高山，无数后继者如奔腾不息的大河，我们看到上海历史教育百年来的发展之路。虽能力有限，但我们仍希望通过努力，表达我们对于往者的敬意，对于行者的称颂，对于来者的期盼。

本书只是几位上海青年历史教师的见闻录，希望通过本书的阅读，大家对于上海历史教学有更近一步的了解。有心的读者，我们希望您在阅读的基础上，不妨更进一步，直接到实地参观、考察、学习、交流。

编者

目 录

历史编	(1)
第一章 海纳百川：上海历史教学研究回顾	(2)
一、源流：民国时期的教师与教学	(2)
二、合流：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教师与教学	(5)
三、奔流：改革开放时代的教师与教学	(12)
第二章 海阔天空：上海历史教材沿革	(23)
一、窥天：第一部中外合编教材	(23)
二、拓天：向“文明史”进发	(28)
三、回天：在通史与文明史之间	(30)
第三章 曾经沧海：上海历史考试漫谈	(32)
一、海源：海派考试缘起谈	(32)
二、海景：海派考试之特点谈	(36)
人物编	(39)
第一章 钱君端：历史教学——我终身热爱的事业	(41)
一、时代与选择	(41)
二、风格的凝练	(42)
三、发展与传承	(44)
四、指导与创新	(46)
第二章 风光宇：做一个不停步的人	(49)
一、成长的足迹	(49)
二、走向广阔天地	(50)
三、教学、教材与人生	(52)
第三章 朱志浩：挥洒激情终无悔，不拘一格求创新	(55)
一、成长的历程	(55)
二、“特级”教研	(57)
案例编	(61)
案例 1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欧洲	(63)
案例 2 第一次世界大战	(70)
案例 3 新文化运动	(77)
案例 4 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	(86)
案例 5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97)
案例 6 美国南北战争	(105)
案例 7 19 世纪的文学艺术成就	(112)
后记	(122)

历史编

第一章 海纳百川： 上海历史教学研究回顾

1931年的秋天，一位叫沈起炜^①的青年考入了驰名中国的东吴大学。他奉父亲之命，要在大学里学习四年的法律，希望能成为律师或者是政府的公务人员。

然而，这时候的中国已是处于快要到“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的境况了。沈起炜实在不愿把大好的青春用在对个人前途的经营上，他更渴望找到一种学问，一种可以对自己解释中国为什么会沦落到这个地步，未来的中国又要走向哪里去的学问。1932年的某一天，沈起炜偶然在图书馆里读到了一篇文章，大意是说社会学才是真正的科学。这篇文章让他激动不已，当即决定不顾父亲的反对，转入社会学系。

但当时的社会学刚传入中国不久，尚缺少与中国社会结合的实证研究，而欧美舶来的理论则显得有些空疏，所以沈起炜对于在社会学系的学习也不甚满意。一直到大学四年级，即到了1934年的下半年，沈起炜读到了周予同的一篇文章，说历史学可以使人明了中国社会何以如此。这篇文章非常合沈起炜的胃口，于是他决定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开始学习历史学。

在1935—1938年这三年里，沈起炜是一个没有工作的“社会青年”。文科生向来找工作难，即便是名校毕业生也难免一度失业的命运。他帮人算过账、打过杂，也在学校里帮人代过课。直到1939年，经一个在上海教书的同学介绍，他进入大同大学附属中学（今上海大同中学）教历史课，这才算是有了一份固定的工作。从此，他开始和上海历史教育结下因缘。

1949年，沈起炜成为第一个从事上海基础教育历史教师培训的讲师^②。20世纪90年代，他又主持了“一期课改”^③教材的编写。可以说，沈起炜先生伴随“海派”历史教学一路走来，是引路人，也是见证者。他的故事，是30年代中国的一个普通青年的平常故事，也是从彼时走来的上海历史教育的故事。

一、源流：民国时期的教师与教学

近代上海以“东方巴黎”著称，为20世纪前半期东亚第一巨型都市。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经成了中国最富市场活力和最富思想活力的地区之一。

辛亥革命之后的二十多年里，上海教育政出多门，在基础教育的管理上一直

^① 沈起炜，1914年出生，苏州人。东吴大学毕业。20世纪30至40年代前先后任教大同大学附属中学、南洋模范中学等校。1949年后调入上海市中学教师进修学院，后入教育学院。上海教育学院最早晋升为教授的两人之一。著有《文天祥》《细说宋朝》《中学历史教师手册》等书，并担任《辞海》编委，上海“一期课改”教材主编。

^② 以上据沈起炜口述回忆，彭禹记录整理，未发表。

^③ “一期课改”为上海第一期课程改革的简称，详见本编第二章。

未形成统一的格局。这本是全国各地都有的情况，而上海则更为突出。当时这座大都市租界林立，国家权力难以介入；即使在租界之外，政府的影响也同样有限。^① 当时上海不同类别的学校很多，如民间私立学校、外国办学校、公立学校等，尤其以私立学校为多，有研究者称之为近代上海的“一大奇观”。在 1929—1934 年间，上海各类别的私立学校占同级类别学校的年平均比例由高到低的排列依次为：私立初级中学，93.67%；私立中学校，88.25%；私立职业学校，84.98%；私立小学校，79.09%；私立独立学院，78.50%；私立幼稚园，73.40%；私立师范学校，70.17%；私立大学校，69.70%；私立专科学校，60.28%；私立初级小学，59.55%；私立高级中学，54.17%。^② 这些学校的管理者和教师首要考虑的并非政府的政策指令，而是高等学校招录学生的需求和学生与家长的口味喜好，由此造成各类学校办学目标、宗旨各异，教师也各行其是。正如画家、美术教育家刘海粟先生在回顾上海美术专门学校 1921 年的教学时指出的：“上海美专是私立的专门学校，所以一切主张只要内容通得过，认为妥善，便可实行，没有什么阻碍和牵制，所以各部分内容可说没有一期不变动、不改进的。因为学校的教学本来是活的，是要依着时代的发展而改进的，决不可以依着死章程去办事。”^③

当时的上海，一般中小学教师收入大致处于社会中等水平。20 世纪 30 年代，中学教师的工资大约是 70~160 元，教导主任、校长可达 160~200 元。一般情况下，一家五口人的生活费每月大约需 30~40 元。因此，一个人的工作不但足以维持家庭生活，而且绰绰有余。由于生活的富足，教师的生活较为丰富，业余爱好也有所发展。根据 1934 年的一份调查，当教师收入超过当时社会工资的平均水平时，半数以上的教师都有看报、参观、看展览、听演讲、参加各种研究会的习惯；40% 以上的教师有阅读书籍的习惯；还有 15% 左右的教师有从事图画、手工艺的爱好。但是，私立学校教师之间的收入差异很大，有的私立学校教师的收入低于公立学校的收入水平，有的则可能大大超过，尤其是工部局（租界管理当局）和有外资津贴的学校，教师的收入可能是公立学校教师收入的一倍以上。^④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公立学校纷纷转入租界，教师的收入也受到影响，但大体来说还算是稳定的。因此，很多中学往往能吸引许多一时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或是有志于从事教育事业的高学历青年。但是，相比于同时期的高校，中学教学的收入又常常达不到作为知识分子的生活要求，因而教师队伍并不是很稳定。很多青年往往因为一时没有工作而进入学校，但一旦找到收入更高或更为理想的工作后，就会选择离开。据 1931 年统计，上海公立中学的 165 名教师中，16 年以上教龄的只有 1 人，而 6 年以内教龄的则多达 161 人，可见这一职业人员流动之频繁。但是，作为知识分子通往高校的中转职业，上海中学教师几乎都有

① 刘关袁：《上海解放前教育督导制度的回顾与研究》，载《上海教育科研》，1989(1)。

② 施扣柱：《民国时代上海对私立学校的管理》，载《社会科学》，2007(2)。

③ 刘海粟：《上海美专十年回顾》，载《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6(2)。

④ 陆庄：《上海市教师课余生活之研究》，43 页，教育编译馆，1935。转引自李彦荣《民国时期上海教师的薪水及其生活状况》，载《民国档案》，2003(1)。

高等师范以上学历，留美博士也并不罕见。

在这样的情况下，学校对教师的管理也相当的宽松，尤其是私立学校。因为这些学校教师的收入大多比公立学校低，校方并不禁止教师出外兼课。从教师的来源来说，无论是教师外出兼课还是学校固定聘用教师，往往采取朋友介绍的方式。因此，在当时的教师中间形成了一个特定的人际圈^①，相互介绍兼课^②，中学也就成为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临时聚集”的地方。

沈起炜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来到上海的。1939年，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因学生增加而需要更多的历史教师，沈起炜的一个朋友刚好是这所学校的教师。经这位朋友的介绍，沈起炜进了这所中学。此后，他也曾在其他学校兼过课，后来跳槽去了南洋模范中学。

由于大多数教师的教龄很短，在学校里很难形成一些特定的教学模式，“百花齐放”也就不可避免。另外，教师的学历很高，且各有所长，都以知识分子自视。

总之，20世纪上半期上海的历史教学，与今天的上海大不相同：

第一，各学校使用的教科书并不一致，要么是各书局出版的教材，要么是学校自印的教材。当时的大同大学附属中学使用的历史教材就是自印的。

第二，教师的术业各有专攻。从课程设置上来说，中学生当然需要学习一遍通史，但教师却不一定非要教完整的通史。因此，当时的中学在安排教学任务时往往采取与大学一样的做法，即由不同的教师负责不同的教学领域。比如，沈起炜当时只负责世界史的教学^③，这是因为当时在大同大学附属中学讲授中国历史的先生是他的前辈，而且他认为这两位前辈的中国史功底要远远超过“半路出家”的自己。当时理科也是如此，如江苏省立第三中学（后改为松江第二中学）的数学，就分别由不同教师授课，要么是专攻几何的，要么是专攻代数的。

第三，教师大都自视甚高，对购置的历史教材往往不屑一顾，但又没有精力自编教材，因而就和大学教师一样，只把教材当作学生学习历史用的一个底本或者是基础性的讲义，而具体到授课，则各行其是。

这一时期的历史教育，后来受到了强烈的批评。包启昌^④在一次接受访问时，称之为“一塌糊涂”^⑤。

当时的历史教育究竟有多“混乱”，新中国成立后期刊上发表的许多对这种“混乱”现象的批评文章中即可窥豹一斑，虽然并没有专指上海。

1958年，《史学月刊》第7期上登载了一篇《搞臭历史教学中的资产阶级个人

① 这种情况部分可参见汤金娣：《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贫民女孩眼中的世界》，载《史林》，2010年增刊。

② 也可参见许杰：《坎坷的道路（二）》，载《新文学史料》，1983（2）。

③ 沈起炜认为自己的专长是宋代史。调入中学教师进修学院后，从事的专业研究方向即是宋代史研究。

④ 包启昌，上海敬业中学常务副校长。1924年出生，圣约翰大学毕业。1956年上海市第一批优秀教师之一，1980年上海市第一批特级教师中唯一的一名历史特级教师。曾任上海历史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教育学会历史教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

⑤ 包启昌回忆，彭禹记录整理，未发表。

主义》，是这样描述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影响的：

有一位教师讲古代史自以为长于诗经就大讲特讲，讲上几个星期。对于先秦诸子思想，则认为非其所长，就草率从事。讲课不按教学进度计划进行，拖延进度有时达三四个星期之久。把教育部颁布的教学大纲随便删减或增添，甚至有一段删去三章的。……讲五代史特别欣赏李后主的词，当堂背上几首……有位教师自以为对古代图腾有研究，别人说他“不说人话好说神话”，他也自以为得意，而津津乐道……有一位教师，自恃才华，自高自大，在课堂上竟敢说范文澜先生研究近代史不懂古文，郭沫若先生不懂什么什么……

这里所揭示的，正是民国时期的一种教学习气。例如：对教科书乃至教育部颁发的教学大纲没有给予足够的尊重；对历史知识没有系统化的建构；没有学术权威的观念；只对学术有强烈的个人追求和表达的欲望；更有甚者，在课堂中随意评论时政；等等。上述种种风气，在20世纪50年代初受到了强烈的批判。

二、合流：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教师与教学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鉴于民国时期教育发展十分不足，而且大批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被蒋介石带往台湾，因此新时期教育面临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要为国家建设培养各方面的人才。为了这一目标，20世纪50年代初期，各中学里的大批教师被抽调以充实大学，有的调任后直接担任系、所主任。当时的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在一年之内被调往大学的教师就多达6人。在这场大潮中，南洋模范中学的沈起炜也被调出，进入了中学教师进修学院（后与上海市教育行政干部学校、干部文化学校和自学广播学校合并为上海教育学院，1998年并入华东师范大学），成了一名大学教师。

这种情况各地皆有，带来的直接影响差相仿佛。

当时，国内各大名牌中学都经历了一次教学岗位大洗牌，历史教师队伍里原有的精英几乎尽失。当时南洋模范中学校长私下里抱怨说：“学校好比是一碗馄饨汤，现在把馄饨全都捞出去，就只剩下汤了。”^①

对于仍留在中学的许多历史教师来说，不能预期进入大学，难免会“望洋兴叹”“心灰意冷”，于是有的中学教师就提出了达到一定水平就应该送在大学去工作的主张^②。在他们看来，这场教育界人员大变动不同于以往的个人选择，变动者不再有回流的可能，不变者亦几乎此生无望。因此，从中学到大学就不再是普通的“跳槽”，而成为了一种“升迁”。

教育环境的变化尚不止于此。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改善教育，政府建立了许多新学校或是扩充了原有学校的规模。由于原有的大批教师被调入高校，从而导致基础教育界师资奇缺。与此同时，上海大批的外资企业撤出中国，原来的国民政府又留下许多不能进入新政权的公务人员，许多人一下子涌入社会。于是，社会上的三教九流都进入中学，而且大多数担任了历史教师，造成了当时历史教育

① 沈起炜回忆，彭禹记录整理，未发表。

② 鲍文希：《笔谈“改进中学历史教学”》，载《历史教学》，1957(7)。

界从业者之来源复杂远逾今日之想象。从他们的知识背景来说,既有科班出身,也有半路出家;从入行前的社会身份来说,既有知识分子社会贤达,也有国民政府遗留下来的转业人员等。正如江河奔腾、泥沙俱下,而鱼龙混杂,难以区别。上海市第五十一中学的历史教研组长鲍文希在1957年《历史教学》杂志组织的一次笔谈中回顾说:“师资的来源,除了师范大学及师范专科学校培养为数寥寥的专业教师外,其他就饥不择食地东拉西扯,有转业人员,短期师资训练班,还有家庭妇女及失业人员。”^①

当然,这部分从业人员中也不尽是缺乏历史学素养者,也有学历相当高且文化素养相当丰厚的人,用藏龙卧虎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市西中学的一位教师原是国民党立法委员。市东中学的某历史教师是民国时期的上校,曾进过庐山高级军官培训班。他的上课很独特,常常是目视天花板而不看学生,但平淡语气下娓娓道来却让学生听得兴高采烈。^②虹口中学的历史教师曹雪松更是民国时期极为有名的剧作家、名演员。他不仅创作了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剧本——《三姊妹》,而且三四十年代脍炙人口的《王先生》(叶浅予原作漫画)系列电影剧本也是出自他手。他本人在影片里还担纲主演王先生的搭档小陈,可以说他在民国后期的上海是无人不识。2008年,香港文汇出版社还出版了《曹雪松电影剧本选》以为纪念。

随着人事的大变动,接踵而至的问题就是教研。据沈起炜先生回忆,上海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开始市教研活动的地方。虽然未经书面可靠材料确认,暂且置之待考,但是上海早期的历史教研的确是很有特点的。

新中国成立前,上海的教师群体是一个自视甚高的知识分子圈子。没有独当一面的本事,要得到圈内人的认可是很难的。被安排什么教学任务,常取决于教师的专长。在教学方面,教师很少相互交流,听课的事情更是非常罕见。沈起炜在大同大学附属中学任教时,虽然和另外两位历史教师很相熟,但在相处的几年中相互之间没有听过一次课,各自的教学风格,只是从闲聊或是从学生的口中得知。

新中国成立后,情形自然有所不同。首先,当时广大教师需要尽快学会如何在教学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其次,对大量“外行”的基础培训迫在眉睫;最后,当时的新式学校不再允许教师各行其是,每个教师都必须完整地教完一个阶段的全套历史课程,即使是从事教学多年的老教师也不得不通过教研来“补缺补差”。

这三个方面的因素综合在一起,催生了最初的历史教学研究。简言之,就是通过各种形式统一教学思想、促成教学实践趋于一致的过程。于是,各学校成立历史教研组,各地成立教师进修学院,组织历史教师进行集体教研与集体备课,以宣讲、研讨等不同的方式,在中学历史教学中自上而下地贯彻国家的教育宗旨。

^① 鲍文希:《笔谈“改进中学历史教学”》,载《历史教学》,1957(7)。

^② 据沈起炜回忆,彭禹记录整理,未发表。

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造，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教学风气出现了新的特点：一是对历史教材的关注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二是大量地引入了苏联的历史教学经验。

对历史教材的关注程度，可从一位教师于1956年在自己的教学体验的描述中见到^①：

狂热的信念逼迫我五次十次地去掌握课文中的事实与思想。当我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跟课文中的思想和情感一点一点地吻合为一的时候，我便触摸到下列境界了：课文中的思想正是我自己想说而说不出或说不全的思想，我自己原有的思想情感完全融化在课文里了。这样到了课堂上，我虽然口上所说的话还是课本上印着的话，但不同点是我的教语已经包孕着课文中的思想和情感，也倾注了我自己的思想情感了。

.....

我们要竭力防止脱离课本上正确的思想情感，而主观向学生散布一套自己对历史事变的体会，这样在我们的思想尚未完成的现阶段，便可能以一些残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情感毒害了青年，这是必须注意的。

这位教师的描述当然是特殊历史环境下的产物^②。但是，类似的教材观被广为接受。在此基础上，以教材为中心的教学研究成为历史教学研究的主流。

对苏联的学习也是20世纪50年代历史教学界的一大景观。50年代初，大批苏联专家将苏联的教育经验，尤其是苏联的教学法带到了中国，并有相当一批苏联教育学和教学法著作翻译成了中文，凯洛夫、卡尔曹夫成了当时中国历史教师耳熟能详的名字。虽然“学苏联”的潮流只有短短几年的时间，但是却给此后的历史教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如对知识系统化的强调，以教材为中心的思想，教学目标、重点难点的教案书写框架，背景、性质、过程、影响的分析套路等，无一不是出自当年苏联专家的传经送道。^③“一堂课一个中心”的教学设计思想即可溯源于此时。1955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夏禹文翻译的苏联瓦庚著的《苏联中学高年级历史教师的备课》。当时的一篇文章^④是这样介绍本书中的这一观点的：

每一堂课都有它的基本思想教育内容。一堂课的基本思想内容应该是只有一个，其他部分应该在教材的内在联系上思想联系上归结到这个基本思想内容上来……思想内容应该是从教材“所叙述的历史现象的本质、规律性、原因、结果、意

① 陈喜：《历史课的“教语”“教态”和“教时”》，载《新史学通讯》，1956(4)。作者所属地不详。

② 从现有材料来看，我们认为照本宣科是高度政治化的产物，而不是应试教育的结果。应试教育在20世纪60年代初和改革开放后两度兴起时，反而出现了教材地位发生动摇的现象。

③ 此处应注意毛泽东写于1929年的《教授法》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学历史教学的影响。毛泽东的《教授法》包括十个要点：启发式（要废止注入式）；由近及远；由浅入深；说话通俗化（新名词要释俗）；说话要明白；说话要有趣味；以姿态助说话；以后反复复习前次的概念；要提纲；干部班要用讨论式。转引自郑美玉：《毛泽东〈教授法〉对珠算教学的启示》，载《黑龙江珠算》，1997(6)。

④ 刘寅生：《“苏联高年级中学历史教师的备课”》，载《历史教学》，1957(1)。

义和评价”中具体地拟定，再根据这基本思想内容有重点有主次的选择和组织。^①

在不同的地方贯彻国家的教育宗旨时，可能会遇到各自不同的情况。例如，上海就遇到了这样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主事者并不能完全服众。当年上海的第一任市教研员李家骥，新中国成立前曾去过延安，后来又辗转回到上海。沈起炜先生回忆时称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相当好”，陆满堂^②先生则称赞他“讲课深入浅出，极有激情，最擅长把深奥的理论讲得简明扼要”。可以说，他是主持上海市历史教研活动与历史教师培训的理想人选。但是，他的自身经历则受到了一些同行的批评。有人认为他没有留在延安是意志不坚定的表现；也有些比较旧派的教师并不觉得马列主义理论功底好就是什么大才能；还有些老教师对他的史学造诣不太服气，甚至有人写信到市教育局要求更换讲课人选。因此，有的教师批评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上海的教研活动是“教育局很少领导，流于各自为政的状态”^③，乍一看来与当时搞得轰轰烈烈的集体教研面貌很不吻合，但是内里未始无因。

第二个问题，则是语言的障碍。当时上海的历史教师大多来自苏州、宁波与上海三地。在进行区、市教研活动时，大家多以本地方言交流，对在场的南下干部来说，颇有诘屈聱牙之感。因此，历史教师在讨论问题时出现偏离主题或者各说各话的情形，主事者很难定夺，更不用说在一片纷纭中指引方向了。

第三个问题，是缺乏对培训者的培训。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对新入职的历史教师的主要培训方法，是组织他们参加教师进修学校的补习班。补习班按照唯物史观将历史知识系统化讲授给培训者，受培训者又往往照搬培训课上的内容回到学校里去上课。这里面的问题在于，培训教师的马列主义知识也往往是出于自学，远没有几十年后经过反复锻造打磨后来得那么的完善和工整；在教学方法上，他们与新中国成立前的许多教师在中学上课时也没有多大差别。正因为培训教师的课往往会对被培训的教师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虽然当时新教师很多，但前一历史时期教学风格的影响并没有因此消亡。^④

当然，也许在当时统一思想的过程中要面临的困难还不止这些，也许上述内容也不一定就是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很显然地，20 世纪上半期历史教学的遗风不可能立刻消除，而且还会在一部分老教师中有所保留。

这种保留在当时的直接表现就是老教师对历史教材不满，乃至谋求突破教材限制。1956 年，新中国第一套部颁教材已经付诸使用。当时的情况是，既有如陈喜这样奉教材为圭臬的，也有对教材进行严厉批评的。1956 年，《历史教学》杂志组织了全国范围内的历史教师进行教学笔谈，在七月号发表的教学笔谈中，参加

^① 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这一观点不再被提起。直到 1981 年，包启昌老师发表《在历史教学中对培养学生思维能力途径的探索》，提出“一堂课一个中心”，对此前的“一堂课一个基本思想内容”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和发展。

^② 陆满堂，1955 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后留校任历史系教师。改革开放后历史教学法研究的开荒者之一，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担任上海高考历史学科命题组组长。

^③ 鲍文希：《笔谈“改进中学历史教学”》，载《历史教学》，1957(7)。

^④ 以上三条原因为沈起炜的看法。沈起炜回忆，彭禹记录整理，未发表。